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

柯 平

摘 要 为了回答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是怎样的体系、有什么样的价值等问题,本文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和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线索,结合相关史料与客观分析,通过“抽象—内核—价值”的思辨路线,揭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之本来面目。本文总结凝炼出中国图书馆学的主要思想——要素思想、藏用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思想、导读思想,揭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以图书文献为本,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教育、科学价值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代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参考文献 49。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思想体系 抽象 内核 价值

分类号 G250.1

Ideolog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bstraction, Core and Value

KE Ping

ABSTRACT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we should not only describe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ibrary science to explore its development law, 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source and evolu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 Moreover,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 is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speciall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oughts of librarians and library science in different tim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s are regarded as a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thoughts. In order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was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form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What is the system? What is it worth?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and moder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is study reveals the true features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rough the thinking route of abstract - core - value, combining with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bjective analysis. The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special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No. 19VXK09) which is one of the projec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柯平,Email:ke2002@nankai.edu.cn,ORCID:0000-0003-4038-6377(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KE Ping,Email:ke2002@nankai.edu.cn,ORCID:0000-0003-4038-6377)

ideo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hought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and absorbing the thought of western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n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library caus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main thought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cluding the thought of essential elements, the thought of collection and use, the thought of book culture, the thought of dissemination, the thought of classification, the thought of guidance, and reveals the core of its ideological system, that is, taking books and documents as the core though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values embodied in the though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ve extremel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func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library and librarianship.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s rooted in the long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bsorbs all the advanced cultural nutrition of the world, and acts on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literacy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though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Library science is a subject with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not only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ience and produces scientific value bu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record. 4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Ideological system. Abstraction. Core. Value.

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史,除了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描述和总结以探讨其发展规律之外,还要对图书馆学思想的来源与演化进行全面研究,而且,图书馆学思想史在图书馆学史中处于突出地位。基于已有的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文献,特别是有关图书馆学家思想和不同时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成果,将图书馆学思想的起源、演化看作一个体系以建立起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是怎样的体系、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不仅能反映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能够阐明中国对世界图书馆学所做出的贡献。

“人类关于世界的任何科学思想,都是构成思想”^[1],图书馆学也不例外。从哲学的反思思想维度来审视,图书馆学已有的思想中惯性地充斥着表象思维和形式思维,缺乏一种思辨思维。因此,本文通过“抽象—内核—价值”的思辨路线,揭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之本原。

1 抽象

1923年我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著作——杨昭哲的《图书馆学》问世,蔡元培为之作序说:“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便有产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有了有系统的理论,那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的进步。这是各种事业的通例,图书馆也就不在例外。”^[2]¹在吸纳国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随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从呼声发展到实际行动,杨昭哲较早地提出将归纳、演绎、证实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法,为图书馆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图书馆学进行多维度科学抽象奠定了基础。

1.1 实践抽象:图书馆学思想来源于图书馆实践

沈祖荣早就提出“图书馆学为实用科学”^[3]。由于图书馆学被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以及相关的事实与活动这些客观存

在与现象所环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感性的认识和经验占据了图书馆学的阵营,以至于时常有人质疑并回答“图书馆学是否为一门科学”。图书馆工作经验的日益丰富和对越来越形式化的图书馆现象的大量描述,不仅不能自发地形成思想和理论,反而增强了实践对于理论指导的呼唤以及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诉求。缺少科学性、抽象性的图书馆学,只能是对经验的知识积累而已,致使图书馆学停留在一个经验时代。正如门捷列夫所言:“永久的、普遍的和统一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逻辑上高于只有在暂时的、个别的和多样的事物中,只有通过理智和被概括的抽象才能认识的现实的东西。”^[4]在这种情势之下,只有将实践经验和感性认识进行科学的抽象,才能形成科学思想和理论。

中国图书馆学“要素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逻辑起点,其价值不亚于阮冈纳赞和西方图书馆学家所提出的思想。但凡讲要素说者均以1929年陶述先的新式图书馆三要素(书籍、馆员、读者)^[5]为起源,却不提更早的1925年梁启超的两要素(读者、读物)^[6]。杜定友1932年正式提出三要素(书、人、法),刘国钧1934年提出四要素(图书、人员、设备、方法)^[7]⁶、1957年又进一步改为“读者、图书、领导和干部、工作方法、建筑与设备”,完善为五要素^[8]。然而,很少有人关注要素思想的实践来源。如果将杜定友和刘国钧的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实践经历相联系,不难发现,杜定友的三要素说是在他相继任广东省立图书馆主任和复旦大学、南洋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等大学的图书馆主任之后形成的思想,而刘国钧的五要素说是在他相继任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和西北图书馆主任之后形成的思想。王子舟认为杜定友“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及进入世界同步发展水平,作出了卓越贡献”^[9]¹⁶⁵。周文骏和王红元认为杜定友、刘国钧、王重民三位先生在各自专业领域中所取得的历史性功勋是后人不能企及的,称刘国钧为“我国现代当代图书馆学的

奠基人之一”^[10]。

虽然人们高度评价了要素说,但也常常会简化甚至曲解要素说。重新审视要素说,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要素说,一种是针对图书馆的要素说,另一种是针对图书馆事业的要素说。杜定友的要三要素思想不是陶述先所指的图书馆要素,而是图书馆事业的要素,是图书馆事业理论基础的“三位一体”,并呈现出以书为重、以法为重和转向重“人”(阅览者)^[11]三个阶段的变化。90年前中国图书馆学就有这样先进的思想,即便今天国际上的人本图书馆学论者也不能及。而刘国钧提出的四要素是针对图书馆的要素,五要素却是针对图书馆事业的要素,他的贡献在于把杜定友的要素说正式上升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内容。要素思想是用一种分析的视角看待图书馆实践,从杜氏“三位一体”的整体观到20世纪80年代在系统科学思维影响下把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看作一个系统,形成了图书馆学以要素为基础的“要素—系统”理论框架。

要素说与20世纪50—80年代形成的“矛盾说”与“规律说”并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的三大学术思想。规律说源于1981年《图书馆学基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提出的“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但是,把这一定义称为“规律说”是不恰当的,因为所有科学都要研究规律(不存在不研究规律的科学),不能将规律与矛盾相对应,准确地说这一观点属于“图书馆事业说”,是要素说发展的结果。矛盾说是在哲学矛盾论以及图书馆工作基本矛盾的讨论中产生的,其突出贡献在于发现了图书馆实践中的两大活动或两大现象,即藏书活动/现象和读者服务活动/现象,图书馆的一切工作均围绕这两个重心展开,与其说是图书馆学要解决“藏与用”两者的矛盾,不如说要处理好“藏与用”这两者的关系。因此,矛盾说的本质是藏用思想。

藏用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高

度概括和提炼。历代藏书活动丰富,包括求书、鉴别、曝书、钞书、保护、管理等,从北宋司马光的“曝书之法”、南宋郑樵的“求书八法”到明祁承燾的“购书三原则”和“鉴书五法”等,形成了比较科学且独具特色的藏书方法和藏书理论。我国古代有比较完善的国家藏书制度,也形成了官方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等藏书体系。《隋书·经籍志》总序首次提出“藏用足以独善”的“藏用说”,“标志着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发展进入新阶段,魏征对图书馆学的认识相当于欧洲14世纪的水平”^{[12]55}。南宋程俱著《麟台故事》,1131年成书,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学理论著作,首次阐述了国家藏书机构具有培养人才、资政参考和“馆职”选拔的职能,初步形成了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古代图书馆学从萌芽到正式形成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古代藏用思想是大藏书或者说是大图书馆思想,远远超出了西方图书馆业务范畴。据清代专论私家藏书技术方法的著作——孙庆增的《藏书纪要》记载,藏书包括购求、鉴别、钞录、校讎、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一系列重要内容。然而,以往的藏用思想研究偏重于“藏”的一面,得出古代“重藏轻用”的结论,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古代藏书事业的刻板印象,以及抑古人之“藏”扬西方之“用”的价值取向。仔细研究古代藏用思想,不难发现其目的是藏以致用,只不过早期是为了少数人利用,而后这一思想不断发展,“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宋代对藏书之“用”已有全面论述与实践,《通志》有“千章万卷,日见流通”^[13]之说。《麟台故事》不仅论述了藏书的购求、整理与典藏,还论述了利用。而宋代李公择创“李氏山房”,开启了私藏公用实践的先河。明姚士粦提出“以传布为藏”^[14],明末清初曹溶倡导藏书借钞互换而作《流通古书约》。17世纪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有了系统化的近代意义的藏用思想,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形成了藏书向社会开放的思想,如清黄虞稷提出的藏书公开思想;二是产生了“儒藏说”,清周永年著《儒藏说》提出为天下寒士建立

儒藏的思想,比明末曹学佺集儒家经典为私藏公用的儒藏说更进一步,树立了公藏公用、以用养才的思想。程焕文认为,宋以后直到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达到了空前的完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不仅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藏书的发展变化,而且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还走在世界图书馆学历史发展的前列”^[15]。

现代图书馆学的藏用思想既是对古代藏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运用矛盾思维和关联思维对矛盾说的进一步发展,从藏与用难以调和的矛盾循环现象转到藏与用常规的关系现象。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形成了图书馆学两大研究领域: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前者发展为藏书政策、藏书评价、文献资源采访、信息组织、信息资源管理等专门领域,后者发展为读者分类、读者心理学、信息服务、知识服务、信息检索、信息素养教育等专门领域。

要素思想和藏用思想是中国人提出的两大图书馆学思想,将实践表象总结和归纳到现象层面,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以杜定友和刘国钧为代表的现代图书馆学第一代学人以这两大思想为基础建立起了应用图书馆学,第二代学人和第三代学人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思维和技术方法研究图书馆实践,进而运用抽象思维,结晶为科学思想,使应用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得以丰富和完善。

1.2 客体抽象:图书馆学思想对具象事物与现象的提炼

实践抽象可以解决现象认识问题,却难以解决本质问题。恩格斯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16]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来源于客观的、丰富的图书馆实践,而客观的、丰富的图书馆实践活动或者现象都是基于客体而存在的。不管图书馆学研究的哪一种观点,都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图书馆及图书馆的客体——图书文献,否则就不是图书馆学。

中国图书馆学对于客体的认识是从图书开始的,将图书和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置于文化的范畴,从而产生了书文化思想。古代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隋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的“五厄论”和明邱濬《图籍之储》《访求遗书疏》的“访书论”等论述中,也体现在古代藏书楼建筑理念和藏书活动之中。现代的这一思想从充分认识图书和图书馆保存文化的价值发展到强调图书和图书馆的文化属性,将图书和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近几年来,在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热潮中,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引起广泛重视,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三史脱节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以书文化思想为核心,统一三史势在必行,这对于重新认识图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图书馆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图书馆本质这一重大理论命题,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讨论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最终形成了两种认识路径:一种从图书馆学的书文化思想基础出发,从文献层面认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的本质;另一种是从图书馆实践拓展和图书馆学科拓展出发,从超越文献层面认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的本质。这两种路径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将图书馆学的客体聚焦到文献传递或知识交流,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的传播思想。

在两次大讨论中,由于以文献作为客体更为具象,因此“事业说”和“图书馆说”被广泛地接受。事业说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国家藏书事业观,吸收并综合了以往的要素说和系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图书馆学^[17]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列宁图书馆事业思想^[18]的影响,强调图书馆与社会联系的整体性,特别是强调图书馆在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吴慰慈是事业说的重要倡导者,其《图书馆学概论》1985年版、2002年修订本、2008年修订二版都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19],继承并发展了刘国钧的事业与要素观。吴慰慈提出了图书馆学的“中介论”,即

认为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是中介性机构”,“图书馆的社会性、依附性、学术性是由中介性派生出来的”^[20]。由于中介论建立了“图书馆—文献—读者”三者的交流模型,并将图书馆作为帮助人们利用文献进行间接交流的中介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介论也是文献交流或文献传播的思想。图书馆说源于针对图书馆的要素说和针对图书馆的矛盾说。作为图书馆说的重要倡导者,黄宗忠认为图书馆是图书文献的存贮和传递中心,“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应该是藏用性,即对图书文献的收藏与利用,或称知识信息的集聚与传递”^[21],这里讲的“传递”实质就是传播。

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有一股思潮,即重视图书馆学科向外拓展,以获得更有利的学科位置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信息资源说”和“知识交流说”分别是信息时代和知识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图书馆学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发展图书馆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在这一思潮中产生的“知识交流”和“文献交流”两大交流学说,都是在传播学思想影响下,不同程度地借鉴了70年代美国谢拉的社会交流思想和苏联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思想。1985年宓浩等提出的知识交流说,关注人类的知识交流现象,将图书馆作为实现知识交流的一个社会实体^[22],已超出了图书馆学的传统客体——文献范畴。1986年周文骏出版的《文献交流引论》既认识到图书馆的文献交流性质,又从整体出发,认为“文献交流是出版发行、图书馆、档案、情报、书目等工作的共同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和目录学等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23],试图在图书馆学科之上构建一级学科——文献交流学,以传播为中心,既强调图书馆学的拓展,又坚守了图书馆学的“文献定位”。

以书文化思想和传播思想为基础构建理论图书馆学,这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第二代学人在第一代学人基础上所做的突出贡献。经过第三代学人的努力,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图书馆

学史、图书馆学方法论基本建立起来,形成了理论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要求拓展的外向思维不断颠覆传统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从拓展图书馆工作到拓展学科的呼声愈加强烈,对于“图书馆学”学科名称的不满直接导致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改名热。这种拓展外向思维本来是值得提倡的,但完全脱离文献客体的图书馆学,脱离图书馆的本质,吸纳各种社会热词,使图书馆领地盲目拓展,导致图书馆业务没有了边界,一旦抛弃图书馆学“初心”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潮占了上风,图书馆学科便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1.3 学术文化抽象:图书馆学思想根植于学术文化和相关学科的土壤

中国图书馆学一直在谋求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有效对接,在构建由应用和理论两大分支构成的现代图书馆学体系过程中,一方面重视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学术文化遗产,将图书馆学思想根植于人类学术文化的土壤中,另一方面注重借鉴和汲取相关学科的知识成果与养分,不断提升图书馆学在学科之林的学术地位;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有目的地吸取西方图书馆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这便是中国图书馆学人的智慧体现。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有着丰富的学术文化源泉,“中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有个专有名词——校雠学。它主要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组成,均以图书为研究对象”^[24]。图书馆学在肥沃的学术文化土壤中孕育并与校雠学、目录学在同一母体内成长,虽无“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之名,却有“藏书楼(图书馆)与藏书校雠目录之学(图书馆学)”之实。因此,校雠学、目录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知识来源,图书馆学与校雠目录学等相关学科同根同源。

中国图书馆学的分类思想正是源于校雠目录学中的学术分类与图书分类。早在汉代,刘

向、刘歆不仅系统地对国家藏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创立了叙录体解题方法,编纂出最早的提要目录《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而且创建了六大类三十八个小的分类体系,“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我国就产生了这样组织严密,并有高度水平的系统目录,是全世界任何古代文明国家所没有的”^[25]。从六分法到四部分类体系的建立,从七分法、九分法到十二分法等多种分类法并存,这不仅是校雠目录学的成果,也是图书馆学的成果,因为没有一种分类法不是在藏书管理和文献整理中诞生的,藏书、分类、目录三位一体成为古代图书馆学的重要特征,其分类不仅仅有分类工具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有系统的分类思想,即以学术分类为基础,既反映藏书与文献特征,又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在分类思想上早于西方且是西方任何图书分类的“工具”思想所不及的。现代西方分类工具引入中国后,并没有被简单采纳,毕竟“洋法”在中国的学术文化环境下水土不服,无法适应中国的图书分类,于是以现代图书馆学第一代学人的智慧,开启了“仿杜”和“改杜”以及分类工具本土化,体现了中国图书馆学在思想方法上的兼收并蓄。第二代学人在分类理论上继承了类例论,建立了思想性标准,在分类实践上创建了“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等现代文献分类工具和方法。尽管现代图书馆学吸收了西方的分类编目思想以及许多现代信息组织方法,但中国的文献分类思想在国际上独树一帜,这不仅是古代图书馆学家的贡献,也是现代图书馆学家的贡献。

从学术文化上看,中国的分类思想与其他图书馆学思想一样,都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包容性和本土化的融合。从“仿杜”和“改杜”到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分类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创新之路。

由于校雠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的共生关系,中国图书馆学甚至将目录学纳入到图书馆学的体系中。杜定友认为“我国向来有目录学、校雠学,也差不多有图书馆学的意思,不过内容却大

不相同”,甚至认为“现在图书馆的宗旨不同了,事业的范围加大了,目录之学,不过是图书馆学中一部分”^{[9]39}。刘国钧建构了我国现代图书馆学早期的内容体系,不仅提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三法(组织法、管理法、使用法)的学科”,而且提出了图书馆学的两种分科方法,一个是四要素分科法,另一个是目录、行政和技术三方面分科法^{[7]1-9},将实用目录学纳入图书馆学体系。而程伯群则将图书馆学的范围分为图书馆行政、图书馆技术、分类编目学和书志目录学四个部分^[26],其中,书志目录学包括书史、印刷史、目录学、校勘、金石拓片、版本、图书馆史,显然是将与图书相关的文化纳入其中。

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与文化不仅为建立图书馆学营造了优越的学术环境和生长条件,产生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图书文献分类思想,而且为发展图书馆学提供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和驱动力,产生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图书文献导读思想。

图书馆学的导读思想源于校讎目录学对图书作用的阐述,从《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到《隋书·经籍志》“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27]的弘道教化思想,从春秋战国的书序到汉代《别录》中的“可观”“皆可观”导读语,再到唐代的《杂钞》和元初的《读书分年日程》,一直到近现代的《书目答问》和《西学书目表》以及国学推荐热潮,奠定了图书馆学集思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导读思想。此外,古代的导读与聚书、藏书紧密相连,祁承燾的《澹生堂藏书训约》就包括《聚书训》《藏书训略》和《读书训》,三者互为辅佐。

图书馆学的导读思想对于现代图书馆学的阅读理论和阅读推广实践,乃至全民阅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代图书馆学第三代学人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建立了由阅读学、阅读心理学、阅读文化等组成的理论体系。

除了蒋永福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所归纳的文献价值观、文献整理观、文献藏用观和馆藏观^[28]外,古代图书馆学的分类思想、导读思想

分别与知识、教育密切相关,应给予高度重视,而且这一思想在近现代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分类思想和导读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对应用图书馆学的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两大领域起到关键性引领作用,而且对理论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2 内核

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源于对实践的抽象、对实体的抽象以及对学术文化环境和相关学科的抽象,要素思想、藏用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思想、导读思想只是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思想,并不是全部。

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和吸收西方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基础上,并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相结合形成的。古代图书馆学体系以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为基础,是古代校讎目录学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包括藏书法、藏书理论、书文化和藏书楼文化、藏书史等。现代图书馆学体系以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为基础,继杨昭愬提出“纯正的图书馆学”和“应用的图书馆学”^{[2]10}、李景新提出“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29]后,产生了两分法(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30]、三分法(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31]和四分法(吴慰慈等的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32],宓浩等的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33])的学科体系,都体现了图书馆学向理论和应用发展的趋势。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事业和学科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受到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中国

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受到各种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从庞大的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中寻找其思想内核,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也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上述“实践—客体—学术文化”三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形成了以图书文献为中心的三个认识层次:一是围绕图书文献进入图书馆后或图书馆系统内部的收藏、管理与利用等各种活动的认识,经过抽象形成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理论以指导实践;二是围绕图书文献进入图书馆前或图书馆系统外部的生产、传播等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经过抽象形成关于图书文化的理论以指导书业和文献事业;三是把图书文献和图书馆置于更大的信息、知识等社会环境中加以认识,在继承中国古代图书文献和图书馆根植的学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基于文献信息和知识载体不断开拓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以提升图书馆学在信息与知识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实践层面的抽象,以图书文献为本,以图书馆为基,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客体层面的抽象,以图书文献为本,以图书文献的生产和传播为根,为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文献信息事业理论与实践确立了根本;学术文化层面的抽象,以图书文献为本,以校雠目录学为源,为立于学术之林的图书馆学科厘清了本源。

进一步考察上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的六大基本思想,可以发现它们都包含一个“以图书文献为本”的思想。要素思想(图书文献为第一要素)、书文化思想、分类思想(图书文献分类)都体现了以图书文献为基础的思想,以图书文献为本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藏用思想(图书文献的收藏与利用)、传播思想(图书文献的传递交流)、导读思想(图书文献导读)体现了以图书文献为工具的思想,以图书文

献为本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依赖和途径。

以图书文献为本的思想作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的内核而存在,不仅是古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思想,也是现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思想,这与现代图书馆学的读者第一、以人为本、以读者或用户为中心的思想并不相悖。没有以图书文献为本的思想,读者第一、以人为本、以读者为中心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不是要完成从书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而是要实现书本位与人本位的高度统一,不是一个中心论,而是两个中心论,要建立现代图书馆学的“图书文献—人”的基本要素框架,这才是图书馆学中人与书关系的辩证法。

图书馆学体系的划分除了按时代划分的古代图书馆学和现代图书馆学,按目的功能划分的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还可以按内容范畴划分,即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划分为微观图书馆学和宏观图书馆学。那么,以图书文献为本的思想在这一图书馆学体系中是如何反映的呢?

从微观图书馆学看,微观研究主要围绕图书馆及“图书文献—人”的基本要素框架展开。“图书文献—人”的基本要素框架在图书馆的体现是: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传播—利用”展开的,是一个以图书文献为中心的价值链,主体是人(图书馆人员),目标也是为了人(读者),图书馆人员收集、整理、传播文献的每个环节都是为了读者,图书馆利用更是为了读者,读者利用图书馆除了利用图书馆的设施设备,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图书文献。

图书馆作为一个系统或者有机体,其中有资源、空间、设施设备、馆员、读者、服务、技术方法、管理、环境等各种要素,有发展规划、资源采集、资源加工、资源布局、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读者教育、服务营销、服务管理、组织文化等各种活动,这些要素和活动都有其价值,各种要素如何组合、各种活动如何组织都是由价值观决定的。继承要素思想,当代图书馆

学产生了新三要素说。虽有“资源、服务、管理”^[34]、“资源、服务、技术”^[35]、“空间、资源、服务”^[36]等不同的观点,但都把资源与服务放到了重要地位。在资源建设中,从强调资源的规模、数量到强调资源的结构和质量,从单一纸质资源建设到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并重的多样化资源建设,从资源长期积累到资源规划和资源评价,已形成了“资源为王”^[37]等观点,其价值观点在于以图书文献资源为本。在读者服务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口号,变“图书馆等读者借阅图书”的被动服务为“图书馆送书上门”的主动服务,建立了由“图书文献→读者”之间的传递渠道和“读者→图书文献”之间的获取渠道。在读者/用户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读者需要什么?图书馆拿什么服务读者?没有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值观,读者服务的一切活动都等于零,一个没有图书文献的图书馆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图书馆,一个缺乏高质量藏书的图书馆也不可能成为好的图书馆。在图书馆管理中,图书馆建筑、设施设备、经费、人员的管理固然重要,但都与藏书/资源管理无法相比或者相提并论,只有树立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要素的管理,图书馆管理才能上升为科学和艺术。用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值观来统领“以资源建设为基础、以读者服务为目标、以科学管理为手段”的图书馆工作,最终实现图书馆的目标与使命。

从宏观图书馆学看,宏观研究主要围绕图书馆事业及“图书文献—图书馆—人”的基本要素框架展开。图书馆事业作为一个体系,纵向上有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市县图书馆等,横向上有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历史经验证明,树立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值观,就可以制定科学的事业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统领并促进事业发展。1957年国务院通过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80年中央书记处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一价值观不仅关系到图书馆标准化、图

书馆评估、图书馆职业伦理等,还关系到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图书馆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去文献化”“去图书馆化”已成为深刻的教训。近年来,图书馆学教育与学科建设回归文献本位、回归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本位已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

无论是微观图书馆学还是宏观图书馆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以图书文献为本,这既没有否认现代图书馆学的读者中心地位,也没有忽视图书馆人员的重要性,而是更加强调了读者和馆员的作用。先秦时期,中国已建立了史官掌管典籍的国家制度,古代图书馆管理者有着较高的学术素养和地位。21世纪初,围绕“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权利”两大主题的大讨论,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这是现代图书馆学第三代学人的贡献。今天,在图书馆职业研究中,不仅要重视馆员的信息素养,也要重视馆员的学术素质,不仅要强调读者至上、服务奉献的职业精神,也要强调守本守业的职业精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提出的以图书文献为本,不是要排除图书馆学中的文献信息、信息、信息资源等一系列关于资源的新概念,而是强调所有这些现代概念都由图书文献而来,都不能脱离“图书文献”这一基本概念。随着图书馆藏书或资源的不断变化,用“信息”或“信息资源”替代文献,或者用“文献信息”实现文献与信息的组合,基本概念的混乱或范畴模糊,都会使得图书文献这一根本在追求时尚中被抛弃,或在信息迷茫中被丢失。因此,以图书文献为本既是各种信息资源之本,也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之本。

3 价值

图书馆学术史已经证明,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几代图书馆学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中国对世界图书馆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围绕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作用于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上文已有阐述;反过来,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作用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这是理论作用于实践的必然。考虑到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关系到社会,特别是文化、教育、科学三个层面,下文主要探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在文化、教育、科学中的价值。

(1) 文化价值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既根植于悠久的中华文化和文明,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的文化营养,又作用于文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以图书文献为本,以书文化作为基本思想,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图书文献的需要,这对于发展文化事业特别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集典籍以经邦立政,将藏书作为治国、治身之基。明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濬《图籍之储》,认为“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者也”,把设立图书馆看作是“治国平天下之要”^[38]。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图书馆在过去为集中保存人类优秀文化做出了贡献,在今天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新形势下承载着更为重要的使命。

第三,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图书馆学人创造的文化财富,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李小缘说“夫图书馆乃文明国之征象,观一国图书馆,可以见一国文化之消长”^{[39]2},可见文化强国必须强图书馆,这对今天的文化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第四,图书文献是传播的载体与工具。中国图书馆学思想认为,图书文献可以传言,可以载道,传播既广大且久远。图书馆通过收集世界各国的文献,使各国文化得到交流与传播,“中国经籍西传,不但影响了欧洲哲学,而且也影响了欧洲政治”^[40]。图书馆既是传播的重要

渠道,又是传播的重要组织者,文献传播思想可指导今天的文化交流活动,将文献交流作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加强国内文献传播与对外文化传播的融合,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 教育价值

英国著名科学家 Pearson 说:“近代科学因其训练心智严格而公正地分析事实,因而特别适宜于促进健全公民的教育。”^[41]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而且还具有更为独特的教育价值。

第一,图书文献具有育人的功用,无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中,早已成为育人的材料和工具。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古代重视以典籍教化民众,六经皆“教也”。杨昭愬认为图书馆在智育、情育、训育三个方面具有极大的效力,而且提出“图书馆教育”^{[2]47}新概念,系统阐述了图书馆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洪有丰认为图书馆对于现受学校教育者、已受学校教育者和未曾肄业学校者均有促其知能生长的作用^[42]。杜定友认为图书馆是学者的养成所、国民修养的中心点、普及教育的中心点^[43]。李小缘更提出“图书馆即是教育”^{[39]4}的观点。现代图书馆更加强调教育意义,将思想性作为评价图书馆的重要标准。

第二,图书馆是人民的大学。古代图书馆学重视图书馆培养国家栋梁人才的功能,而现代图书馆学强调图书馆属于人民大众。李大钊论图书馆和教育的密切关系时提出“要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研究室”^[44],徐旭认为民众图书馆“是为实施民众教育最合适的机关”^[45]。图书馆作为终身教育场所而存在,其价值在于育人才、成人才,这是中国图书馆学思想赋予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使命。

第三,导读思想是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对于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全民素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按照导读思想,大众教育不仅是为了读书学习,获取知识,提升职业竞争力,而且是为了读书修养,让阅读作为一种生活,以丰富精神世界。

第四,在现代社会,素养教育越来越重要,中国图书馆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文献检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素养教育已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书文化素养和阅读素养进入素养教育体系,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与素养问题。

(3) 科学价值

图书馆学是一门具有跨学科应用特征的学科,不仅具有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产生科学价值,而且具有知识和科学记录的功能。“图书馆学专门研究人类记载的产生、保存和应用”^[46],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科学的辅助学科。

第一,图书文献是知识的载体,既是科学研究的结晶,也是科学研究依赖的原料与工具。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的创新性劳动,其继承性特点决定了图书文献的重要价值。图书馆既是人类的记忆器、社会的公共大脑,也是知识与科学的储备库与后勤保障装置。以图书文献为本的思想,完整地保存了科学发展全过程的记录,促进科学文献与科学研究良性互动。

第二,为科学服务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也是图书馆学的重要使命。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图书馆的性质看,“图书馆是一种科学事业”^[47],“在文化进步之历程中,图书馆乃学术研究之惟一的工具”^[48]。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指引下,图书馆学加强了科学文献的研究,建立了科学文献学;在实践方面,图书馆搜集整理各门学科的核心著作、核心期刊,整合知识库文献、网络文献等,并通过文献检索、学科导航、学科服务等理论与实践,为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图书馆学为各门学科提供的文献计量、引文分析、内容分析、知识图谱等工具与方法,对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

第三,古代没有科学史和科学学这样的专门学问,目录学和图书馆学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科学史的职能。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重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

想不仅能够指导各门学科史的建设,也对今天的科学史和科学学具有指导作用。

第四,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的分类思想对于现代科学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思想,可以揭示科学分类的变化以及科学与文献的关系。面对今天的知识世界,如何处理学科的综合与分化,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今天大科学和交叉学科的新形势下,参考借鉴“类例犹持军”的分类思想,可以解决科学分类的难题。

4 结语

中国图书馆学是在古老的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中孕育和诞生的,经历了长期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总结,形成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图书馆学著作《麟台故事》^{[12]56},其中体现出来的藏书思想比欧洲图书馆学奠基者诺代的《关于创办图书馆的意见书》和莱布尼茨^[49]的图书馆管理思想要早 500 年,而且形成了既有深厚人文底蕴又博大精深的图书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足以使当代图书馆学人树立更加强烈的学科自信。

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人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图书馆发展之路。20 世纪初向欧美等西方国家学习,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再次传入,经过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三代学人的艰苦探索,已经从被动接受影响到主动寻求交流合作,从单纯的固守传统或排斥影响到以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为本、以外国图书馆思想为用的辩证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体系的指引下,图书馆学经过从实践经验到方法论与理论认知,再到科学抽象的两次思想革命,已脱离前科学阶段进入到常规科学阶段。

今天,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契机,发展图书馆

学的中国学派、向世界图书馆学界传播中国思想和中国声音,这一历史的责任和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新一代图书馆学人的肩上。

参考文献

- [1] 孙正聿. 哲学修养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8. (Sun Z Y. Fifteen lectures on philosophical cultivation[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8.)
- [2] 杨昭愬. 图书馆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Yang Z Z.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3.)
- [3] 沈祖棻. 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J]. 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1(1):3-6. (Shen Z R. Several hopes for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29, 1(1): 3-6.)
- [4] 札布罗茨基. 门得列也夫的世界观[M]. 张光楠,徐贤珊,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62. (Zabrotsky. Mendeleyev's world outlook[M]. Zhang G N, Xu X S,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62.)
- [5] 陶述先. 图书馆广告学[J]. 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1(3):241-249. (Tao S X. Library advertising[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29, 1(3): 241-249.)
- [6]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11-15. (Liang Q C. Speech at the founding meeting of the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J]. Bulletin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25, 1(1): 11-15.)
- [7]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M]. 上海:中华书局,1934. (Liu G J. Essentials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4.)
- [8]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C]//史永元,张树华.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32-138. (Liu G J. What is library science[C]//Shi Y Y, Zhang S H. Selected papers on library science by Liu Guojun[M]. Beijing: 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3: 132-138.)
- [9] 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Wang Z Z. Du Dingyou and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2.)
- [10] 周文骏,王红元.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5. (Zhou W J, Wang H Y. Historical manuscrip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October 1949 to December 1979)[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265.)
- [11] 杜定友. 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J].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1(9):23-28. (Du D Y. New views on library management methods[J]. Monthly Journal of Zhejiang Library, 1932, 1(9): 23-28.)
- [12] 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Wu W C. Fundamentals of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 [13] 郑樵. 通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7:3. (Zheng Q. Tongzh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3.)
- [14] 叶昌炽. 藏书记事诗(附补正)[M]. 王欣夫,补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72-273. (Ye C C. Collection and chronicle poems(with corrections)[M]. Wang X F, correct.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272-273.)
- [15] 程焕文. 略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形成时期的几个问题[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2):14-18. (Cheng H W. A brief discussion on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thought[J]. Library Work and Research, 1989(2): 14-18.)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for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Selected

-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3[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564.)
- [17] 阿勃拉莫夫, 等. 图书馆学普通教程[M]. 俄文版. 莫斯科: 图书出版局出版社, 1988: 31. (Abramov, et al. General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M]. Russian edition. Moscow: Book Publishing Bureau Press, 1988: 31.)
- [18] 丘巴梁. 普通图书馆学[M]. 徐克敏, 等, 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112. (Qiu B L. General library science[M]. Xu K M, et al, trans. Beijing: 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3: 112.)
- [19] 吴慰慈, 董焱. 图书馆学概论(修订二版)[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1. (Wu W C, Dong Y.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Revised Second Edition)[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8: 11.)
- [20] 吴慰慈, 董焱. 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77-80. (Wu W C, Dong Y.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Revised Version)[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2: 77-80.)
- [21]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133. (Huang Z Z.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3.)
- [22] 宓浩, 黄纯元.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C]//吴慰慈, 邵巍. 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20-38. (Mi H, Huang C Y.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C]//Wu W C, Shao W. Selected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eijing: 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5: 20-38.)
- [23] 周文骏. 文献交流引论[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3. (Zhou W J.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exchange[M]. Beijing: 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6: 3.)
- [24]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41. (Wang Z Z. Basic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1.)
- [25] 王重民.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4. (Wang Z M.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24.)
- [26] 程伯群. 比较图书馆学[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5: 1-3. (Cheng B Q. Comparative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House, 1935: 1-3.)
- [27] 王承略, 刘心明.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 第13卷[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7. (Wang C L, Liu X M. Supplement to literature and art records of the Twenty-Five Histories: Volume 13[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3: 7.)
- [28] 蒋永福.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195-359. (Jiang Y 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1: 195-359.)
- [29] 李景新. 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5, 7(2): 263-302. (Li J X. Can library science become an independent science?[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35, 7(2): 263-302.)
- [30] 倪波, 苟昌荣.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1: 81. (Ni B, Xun C R. Theory library science course[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981: 81.)
- [31] 周文骏. 概论图书馆学[J]. 图书馆学研究, 1983(3): 10-18. (Zhou W J.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1983(3): 10-18.)
- [32] 吴慰慈, 邵巍. 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14. (Wu W C, Shao W.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5: 14.)
- [33] 宓浩, 刘迅, 黄纯元.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236. (Mi H, Liu X, Huang C Y. Principles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236.)
- [34] 柯平, 等. 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436. (Ke P, et al. Research on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6: 436.)
- [35] 范并思. 纪念图书馆2.0运动五周年[J]. 图书情报研究, 2011, 4(4): 21-24, 20. (Fan B S. Commemorating

-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rary 2.0 move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1, 4(4): 21-24, 20.)
- [36] 刘兹恒,涂志芳. 数字学术环境下学术图书馆发展新形态研究——以空间、资源和服务“三要素”为视角[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16): 15-23. (Liu Z H, Tu Z F. Research on the new states of academic library development in digital scholarship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resource and servi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2017, 61(16): 15-23.)
- [37] 程焕文. 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程焕文谈高校图书馆管理的理念[J]. 晋图学刊, 2020(1): 1-10. (Cheng H W. Resources as king, service as foundation, technology as use: Cheng Huanwen talking about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J]. Shanxi Library Journal, 2020(1): 1-10.)
- [38] 邱濬. 书籍之储[G]//邱濬. 大学衍义补.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803. (Qiu J. On the storage of books [G]//Qiu J. Daxue yanyi bu (Supplementation to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great learning). Beijing: Jinghua publishing house, 1999: 803.)
- [39] 李小缘. 图书馆学[M]. 南京: 第四中山大学讲义, 1927. (Li X Y. Library science[M]. Nanjing: Lecture Notes of the Four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27.)
- [40] 季羨林.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98-100. (Ji X L. Thirty years Hedong, thirty years Hexi[M]. Beijing: Contemporary China Press, 2006: 98-100.)
- [41] Pearson K. 科学的规范[M]. 李醒民,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12. (Pearson K. Scientific norms[M]. Li X M,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99: 12.)
- [42] 洪有丰.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3-5. (Hong Y F.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6: 3-5.)
- [43] 杜定友. 图书馆学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3. (Du D Y.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1-3.)
- [44] 李大钊. 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辞[G]//李希泌, 张树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69-171. (Li D Z. Speech at the second anniversary meeting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G]//Li X M, Zhang S H. Chinese ancient book collection and modern lib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arou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169-171.)
- [45] 徐旭. 民众图书馆释义[J]. 民众教育学报, 1932(创刊号): 86-90. (Xu X.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library [J]. Journal of People's Education, 1932(founding number): 86-90.)
- [46] 杜定友. 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G]//钱亚新, 白国应. 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7-44. (Du D Y.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library science[G]//Qian Y X, Bai G Y. Selected papers of Du Dingyou on library science. Beijing: 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8: 7-44.)
- [47] 梁林德. 论图书馆的基本性质[J]. 图书馆学研究, 1984(5): 25-31. (Liang L D. On the basic nature of library[J].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1984(5): 25-31.)
- [48] 钱存训. 图书馆与学术研究[G]//叶继元. 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 图书馆学卷.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796-808. (Qian C X. Library and academic research[G]//Ye J Y. Centennial academic excellen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volume of library scienc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796-808.)
- [49] 况能富. 东西方图书馆学奠基者事略[J]. 图书情报工作, 1983(6): 32-37. (Kuang N F. A brief of the founders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83(6): 32-37.)

柯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天津 300071。

(收稿日期: 2021-09-26)